

现代技术问题:从边缘到中心

张成岗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现代技术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难题之一,已引起诸多学者关注并成为重要讨论域。技术问题成为思想史上中心议题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以该问题作学术主题画坐标轴,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绿色运动、未来学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等都会跃然其上。站在历史文化学宏观视角,梳理出技术问题凸现的内在逻辑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技术问题;存在主义;批判理论;人文主义;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6 - 0037 - 04

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技术进步一直在证明人支配自然的神话和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20世纪,在取得极大成功,带来巨大物质繁荣的同时,现代技术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技术产生后果与技术目标背离越来越远,个人、社会、环境三个层次展现出持续不断的动荡不安。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文明、道德、价值等诸多危机,都在技术上寻求病理根源,“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种力量更能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进程了,事实上,不管技术从何而来,又流向何方,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在这里聚集起来”,“技术尽管不能被断定为问题之源,但却折射着所有问题”。^[1]

现代技术问题主要出现在西方,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运动必然后果,但我们“应该通过了解西方社会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2]因此,研究技术问题已成为迫切的时代要求和紧要的学术使命,“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难以回避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因为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前途和未来的沉思与求索”。^[3]对技术问题进行研究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回归当时语境、站在思想史宏观视角对其历史凸现进行审视。本文试图借助历史溯源方法,梳理和剖析现代技术问题凸现内在历程,以更深刻理解现代技术这一“开始染指人类历史根基”的重要现象。

一 技术问题的初步显露

18世纪,以牛顿力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体系已建立起

来,在此基础上,技术也获得了极快发展并被应用到生产中去。相应地,人们对技术产生了崇拜,普遍相信通过理性可以获得自然知识进而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实现人类发展。“在此之前,当人们瞻目未来时,他们目光所投之处乃是世界终结和最后审判日,而现在,他们却期待着文明尽善尽美”。^[4]

通常认为,对技术问题的察觉始于卢梭。他较早地感觉到技术与道德的矛盾,开始质疑以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文明,“正是这种能力,在各个时代中,使人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谬误、邪恶和美德,终于使他成为人类自己和自然界的暴君……”。^[5]在一项奖金颁给论述艺术和科学技术对于改善公众道德作用的最佳论文时,他应征撰文,声称“科学(技术)已经损害了道德”,表明其惊破民众依靠技术达到文明至善美梦的决心。他主要从以下方面论述技术问题:(1)人的退化。有技术“文明人”在体能和技巧上远远比不过无技术“野蛮人”,文明人因技术而丧失了人最有价值的东西,“技术所提供的正是技术所剥夺的人类固有的力量和灵敏,还有道德和勇气,使人类的文明依赖于随时可以不属于自己的技术,人类必将变得更加脆弱,并日益走向衰落”。^[6](2)人性扁平化。在技术文明话语下,人们不遵循自己天性,不敢表现真正自我,“我们的时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3)道德沦丧、社会腐败。技术、道德的冲突基于如下逻辑推理:技术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闲逸时间增多——奢侈——勇敢、尚武和德行丧失。

【收稿日期】 2003 - 03 - 26

【作者简介】 张成岗(1973 -),男,河北赞皇人,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技社会学。

遵照社会病理学观点,在启蒙时代,技术问题尚不成其为“问题”,卢梭在启蒙起始就察觉到技术与道德之冲突及其对人性之压抑,这无疑不是缺乏反思与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所能做到的。卢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回归自然”,他认为,人类应当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当然,素朴的回归自然思想未免流于浪漫,对技术问题解决也与事无补。

二 技术问题的思辨性追问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以技术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经过高度发展,将其对人类精神生活之危害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现代技术文明把社会变成了一种压抑精神生活的巨大官僚机器,技术理性对效益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了唯利是图倾向,并渗透到社会每一角落,极大损害了对人类精神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亲情感和家园感,世界变成了冷静计算和工业进取的对象,不再是整体和有机的栖息地。

相应地,思想史上出现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崇尚实证科学及其技术成果,感到繁荣昌盛与实证科学在扩大其领域和方法论中不断取得成功有着密切联系,实证主义成为最有影响的思想潮流;同时,一批思想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詹姆斯、韦伯等却在谈论技术危机问题,这些“另类人文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以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表现出的问题,并从特定学术视角做出了各自独特回应。

1935年,胡塞尔在布拉格讲演中明确提出“欧洲科学的危机”,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试图阐明“科学的危机是欧洲人严重的生活危机的表现”,指出科学“抽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使物成为纯粹的物”,^[7]对于“整个人的生存有意义或无意义的问题”无所作为。

胡塞尔洞察到总体性危机背后隐藏着深刻历史根源,并将其追溯到文艺复兴,认为,欧洲人性自主性通过文艺复兴时期新哲学理念的确立得以形成;同时“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又为欧洲人性危机埋下祸根,在其后历史演变中,随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变种如实证主义、二元论等统治欧洲大陆,造成了危机状况。

严格意义上,胡塞尔并未直接论及技术问题,但他对欧洲科学危机的揭批实际上是从文化角度对技术问题的思索。

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通过反复训练和体验逐步通晓了现象学哲学,他希望现象学方法为其提出和解决“存在意义”提供一条可能途径。围绕“存在意义”主题,海德格尔论述涉及语言、艺术、技术、诗歌和思想等方面。

在《关于技术问题》(1953)一书中,海德格尔首次使用“技术问题”的概念,而正是其对“技术问题”的思辨性追问,决定了“任何对技术哲学历史的或批判的考察都不可能承受起对海德格尔的忽视”。^[2]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西方历史决定命运,它在现时代的至上能力和虚无主义发展,将形而上学推上顶点。现代技术构成了我们时代最高危险,并不是因为技术已经把人类种族推到了生态灭绝和政治自杀边缘,更重要的是它使存在天命蔽而不现。

应当说,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较早对技术问题进行了学院式反思,其分析隶属纯哲学、纯思辨层面,技术的社会建制,技术引起的具体社会变革不是他们分析的主要内容。他们主要进行认识论、本体论的抽象讨论,论及技术抽象本质、技术与“存在”等问题,现代社会的种种不幸仅仅被看作人存在状况的某种“偏差”,思想家任务就是告诉人们,这种偏差在认识论、本体论上如何产生,事物本来应是什么样子,在那里不可能找到对人在技术社会具体生存状况的描述和人应当走向何处的明确阐释。

在思想史序列和理论倾向上,对技术问题研究都经历了从纯粹思辨到社会理论批判和从理论到实践的挪移过程。

三 技术问题的多维度批判

1. 技术问题的社会文化批判

空前繁荣的技术文明并没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中蕴藏的基本矛盾,反而使其不断蓄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及精神生活诸方面存在的“痼疾”日益清晰地暴露,特别是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们对资本主义掠夺性生产方式的批判越来越激烈。

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产生的法兰克福学派,不仅以对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的批判闻名于世,同时开辟了从技术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先河。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解放,技术异化是人异化和社会异化的重要根源,正如霍克海默明确表达的:“无论是科学成就,还是工业技术进步都不直接等同于真正的人类进步,……科学和技术仅仅是现存社会整体的部分,尽管它们取得了所有那些成就,其他要素,甚至社会整体本身可能都在倒退”。^[9]

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批判哲学理论源头,后期批判理论则完成从资本主义历史批判向整个文明人类学批判转变,借助韦伯合理化理论而走向了工具理性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看来,铸造现代文明的技术成了为资本控制整个社会服务的实用工具,进而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上升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现代文化,包括科学道德和艺术已完全工具理性化,变成非理性意识形态,科学已变成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技术知识。为了技术有效性,科学放弃了成为理论知识的要求。技术不再是“中立”概念,“技术理性已成为政治理性”。他们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能把生产力增长用于人类解放目的的积极社会力量存在,工具理性增长就是理性失落,“工具化的理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相结合就会产生各种越来越密集地控制人行为的社会结构,从而瓦解人类生存的自由空间”。^[10]

由于深受现象学、存在主义传统影响,批判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人本主义社会思潮,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已开始摆脱存在主义、现象学纯思辨传统,坚持思维走向实践,对现代社会具体研究中抽出自身理论,其理论目光已从抽象“存在”转向社会现实,关注焦点从技术形而上学特性转向技术与社会关系,他们将人的存在条件作为分析基点,不是围绕技术抽象性质,而是着眼于技术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理论剖析。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具有直接社会影响,有改

造社会具体目标和较为具体方案,而不只是“形而上学玄思”。

2. 技术问题的人文主义批判

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批判理论分别从存在、社会和文化视角对技术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揭批。然而,从技术本身具体运行中详细考察技术本身运作方式以及技术对社会和文化作用方式,在前述理论很难见到。随着技术哲学进入成熟阶段,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埃吕尔等人走向了对技术本身的更具体反思,甚至包括对信息、生物等具体技术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评价,从而将技术问题的研究推进到新境地。

从经典性著作《技术与文明》开始,技术问题一直是芒福德关注问题之一。他认为,“我们时代正在由一种不得不借助工具和武器发明实现对自然支配的人类原始状态,转变成完全不同的新人类境况。……人类不仅已经完全控制了自然,而且也把自己从其有机栖息地彻底分离开。”^[11]

作为对“人是工具制造者”论断的反驳,芒福德指出,“人是精神制造者、是符号制造的和自我主宰的动物。”^[12]在他看来,技术应当只是作为一个服务于人的附属工具。他认为,从起源上看,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相应的人类生活具有兴趣、目的、意义多样性,而以机器为中心的现代技术是劳动、权力和利润指向的,由于与其它部分相分离,劳动变成一种负担、牺牲和惩罚。他认为,现代人类被汇集在“巨机器”中。巨机器的滥用是技术问题的重要根源,因为,巨机器效率来源于劳动中重复性动作,它使劳动者习惯于从事惯例性劳动,从而陷入恶魔式无意识状态,“在巨机器中,机械化与严格管理已经替代仪式而成为一种对付忧虑并促进心理稳定的手段。”^[13]在这种社会中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必定会衰退,文明发展也会失去原动力。

关于如何把人从巨机器中解放出来,芒福德没有提供现成方案,但他确信,首要一步是要仔细考虑人类本性与机器的关系,最终从劳动指向技术回归到生命指向技术,“生命技术的整个世界将会对人具有更大开放性。那些残缺不全的人性将会重新获得活力。”^[14]

埃吕尔认为,用“系统”一词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现代技术哲学本质,他指出,现代技术最根本特性是自主性,现代技术根据自身内在逻辑运行,已形成相对独立、封闭的世界,而且“技术对于经济和政治同样是自主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当前,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进化都不能制约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不取决于社会形式。……技术会诱导和制约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变革,技术是所有其他东西的最初动因。”^[15]说到底,整个社会和人人都不能控制技术,作为系统的技术现在是一种权力,“没有人可能约束住权力,本质上权力阻止一切质疑,逃避一切控制它的企图。”^[16]

埃吕尔认为,技术与人性相冲突,“在社会中技术活动越多,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就越少”,因而,技术并不能带给人类真正幸福,技术进步给人类提供各种选择“自由”是幻象,“人看来获得了更大自由。他可以听他喜欢的音乐,穿他喜欢的衣裳,拥有完全离经叛道的宗教信仰或者道德态度;可惜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对技术系统提出挑战。技术甚至还为

人类提供了多样化手段。但这些多样性仅在技术起作用的限度内存在……”^[17]

埃吕尔认为,“技术问题”主要是人本身被纳入技术系统中,不能提出对系统的反思,技术把人改造成了简单实践者。对于如何摆脱技术系统,重新把握与拥有人的本质,埃吕尔没有给出答案。但他认为,普通人、政治家、权贵们、技术家、科学家、教育家等都不能担此重任,技术问题需要被进一步思索。

3. 技术问题的生态学批判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对技术问题的反思,一直不是文化主流。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该问题的理性反思与环境问题紧密结合产生出生态学批判理论,并发展成一股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从此以后,对技术问题的抽象反思、对技术运行过程、特性的具体分析开始走向现实,思想家们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寻求新的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思想史上又一道风景线,从而实现了技术问题学术研究范式另一转换。

从生态学角度对技术进行反思与批判,是近几十年来整个人类生态觉醒的结果,就像一场新启蒙,其目的是唤醒人们对自己行为、思想和生存条件的重新审视。以对生态问题性质的看法及解决问题根本途径可将整个理论分为“浅绿”和“深绿”理论。浅绿理论要求在不变动现代社会基本结构,不改变现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基础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社会机制推行一些必要环境政策,来改变环境现状,他们普遍相信,现有社会加上科技进步足以解决生态问题。深绿理论则认为现有社会机制和人的行为模式是问题根源,必须彻底打破,并代之以崭新机制和模式,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两类,其一是进行社会 and 价值观重建,“发展一种生活方式,给予物质东西以应有的合理地位,即次要而不是主要的地位”;其二是发展对人和环境有益的适当技术。

绿色理论不仅仅限于思想层面,还积极走向实践,形成了“绿色政治”运动。绿色政治内容不仅仅体现在一些学者论著,还体现在环保运动基本主张和绿党政治、经济纲领中。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主要国家千百万人不断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进入80年代以后,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士等国的绿党相继通过大选在议会中取得数量不等席位,取得一定政治地位、政治权力。“绿色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体现了生态学技术批判理论强烈的实践倾向。

生态主义者正确地揭示出现代技术的反生态后果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不论其对未来社会构想是否现实,生态运动对现代技术理想状态所作的根本性批判,其所探讨的人类技术应有模式,都可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自己工作进行再思考的契机。

生态学技术批判理论完成了对技术问题从“生存批判”到“生态批判”的转换。技术开发自然所导致的“生态问题”,与前面人文学者批判技术本质、文化等所导致的“生存问题”完全不同^[18]。生存问题主要指社会生活方式本身已使按照某种价值观念来衡量的人之合理存在发生危机,生存批判背

后往往没有直接社会背景(甚至常常让人感觉是脱离现实生活问题的玄想),它通常通过批判习俗文化观念、解蔽存在本质,来使人找到失落的本质、意义和价值。生态问题则指人们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严重到影响人自然生命的正常维持,其极端状况是整个人类在自然物质意义上的消亡。生态批判通常有着现实的社会经济因素,甚至以可直接感受到的物质效应作为背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都是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它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怎样才能维持一个星球上的自然物质生命存在;其次才是如何享受一个更“好”的生活。

对技术问题反思从“生存批判”发展到“生态批判”,标志着技术问题已经从一个深层“学术问题”、“玄思问题”浮到“实践层面”、“民众层面”,成为一种与大多数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全球问题,具有了技术问题“公共性”、“危害性”等基本特征,开始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

四 技术问题:从边缘到中心

在以原始技术为根基的农业社会,人们总是看过去,运用以往经验;在以机器技术为根基的工业社会,人们总是看当前,注重眼前实践活动和利益得失;在以信息技术为根基的后工业社会,人们总是看未来,瞩目于未来发展和利益。在进步、繁荣与危机、问题共生的当代世界中,在技术问题开始走向中心的境况下,对现代技术的预测研究也随之兴起,对该问题研究呈现出一种综合视域交汇的态势。

作为对人类未来命运关切的学术反映,西方兴起了未来学研究,自从《增长的极限》为人们勾画了一幅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灾难图景以来,未来学在西方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先后成立了不少未来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赫德森研究所、世界未来学会;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巴黎的国际未来可能性协会、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荷兰的人类2000年国际协会等。未来研究目的是根据对当前世界状况的理解去预测未来,通过揭示现象内在相互联系和发生原因以及决定未来发展动态的最重要因素,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发生;区别哪些是必然发生的,哪些是可能控制的,试图为“技术时代设计新的世界蓝图”。

未来学对技术问题的关注,标志对该问题研究从对技术所引起当代状况批判延伸到对技术运用状况未来预测,从而呈现出一种综合视野,未来学开辟了对技术问题进行模型预测研究的新阶段,福雷斯 World2、World3 模型都通过数据在计算机内的实际运行对技术世界未来做出预测,这些研究报告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可看作此类研究的直接影响。此后,技术问题已经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对其所进行的多视角研究开始深入展开。

从卢梭察觉到潜在技术问题;到现象学、存在主义大师从抽象的人的存在出发批判技术文化观念,反思技术形而上学本质,寻求解救之路;到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批判技术;到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技术具体运行机制、技术特性,揭露技术问题;到绿色运动从思想上对技术问题生态根源进行反思,在政治实践上建立政党、提出政治纲领,发动运动;到未来学对技术问题模型预测

研究。技术问题从边缘走向中心,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了一个未来发展中的绕不过的重要问题。

技术问题是具有深刻历史渊源的复杂性问题,有其产生、发展、彰现的历程。相应地,人类对技术问题的思想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直觉到抽象反思到社会文化批判到生态批判的逐渐具体化道路;空间维度上,学者们将技术问题从自身认知的狭隘范围逐步扩展到民众中间的广阔领域,时间维度上,学者们从对技术状况的当代批判扩展到对技术应用未来预测;学者对技术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哲学、社会学的学院式学术研究,“进入”由绿色思想指引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逐步实践化道路。

当前盛行西方的后现代思潮也是西方对技术问题关注的反映。作为被置放于中心的问题,技术问题必须得到更深入研究,而弄清楚问题在思想史上的凸现历程无疑对以后相关研究具有基础作用,这也正是本文理论意图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3]高亮华,“技术转向”与技术哲学[J]. 哲学研究, 2001 (1). 25、25.
- [2][美]大卫·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7.
- [4]雅斯贝尔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
- [5]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4.
- [6]肖峰. 高技术时代的人文忧患[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2.
- [7]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71.
- [8]M. Zimmerman.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1980. pr, px.
- [10]汪行福. 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35.
- [11]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J].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ed. by C. Mithcha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p77.
- [12][13][14]高亮华.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3 - 47、54、57.
- [15]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J]. In: Mitcham C, ed,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 [16]Ellul. The Technological Bluff [M],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157.
- [17]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M].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0. 109.
- [18]叶闯. 科学主义批判与技术社会批判[M]. 台湾:淑馨出版社,1996. 145 - 148.

(责任编辑 魏屹东)